

世纪之交 的工业结构升级

江小涓 著



中国经济发展研究论丛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世纪之交的工业结构升级

江小涓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责任编辑 徐鸿泉
封面设计 赵小卫
责任出版 孔宪林
责任校对 俞德明

·中国经济发展研究论丛·

世纪之交的工业结构升级

江小涓 著

出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编 200233)	开本	850×1168 1/32
发行	上海远东出版社	印张	8.25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字数	180,000
排版	上海希望电脑排印中心	插页	4
印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

ISBN 7-80613-404-2 / F·217

定价: 14.00 元



总序

走向繁荣的中国经济

刘国光

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至今已经历近半个世纪。在这段时期中,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如何将丧失了近百年的发展机遇的时间抢回来,如何使生活在占世界 7% 土地上的、占世界 20% 的人口尽快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经过艰难的探索,在为发展计划经济艰苦奋斗 30 年之后,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79 年以前,我们从本本出发,按照原苏联的思路,以为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不能接受市场机制,“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在大约近 30 年的时间里,我们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政策 and 实践之外。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家庭和个人消费什么、消费多少,都由国家计划从上到下决定,企业、家庭和个人在经济行为中缺乏自主

选择,没有横向竞争。不可否认,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本来短缺的资源动员,使我们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变了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并且消除了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

但是,原来那种排斥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由于强调“一大二公”,强调全面计划化,经济系统内缺乏竞争,缺乏优胜劣汰的机制,缺乏一个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微观基础。经济行为的效率要靠自上而下的宣传鼓动和行政指令来维持,加上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的干扰,“从 1958 年至 1978 年,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基本上是停滞的”,而且经常是大起大落,强周期波动,经济结构经常出现大失衡后的大调整,大调整后的大失衡。由此我们发现,社会主义排斥市场,排斥商品生产,排斥竞争和价格调节,并不是一个科学的选择。

早在 70 年代的中期,邓小平同志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作出了开拓性的探索。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上半期,他在著名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对现代经济发展规律作出了最新的概括: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应当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按照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寻求公有制和市场相结合的途径,努力实现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正是我们改革的基本目标和选择。

过去 18 年,我们在这一选择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市场体系和改革宏观调控机制这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的实践已经证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它既适合中国自身的国情,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又与现代世界经济规律相适应。我们深信,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和情况,这一选择都不会放弃,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是不可能逆转的。

中国经济发展走上市场之路,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对世界来说是一件大事,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创举。翻开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相结合? 80 年代,我们只是摸着石头过河,到 90 年代,才有了清楚明确的目标。但是,应当看到,目标不等于现实,要使目标变成为现实,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还将面临并要在实践中逐步解决许多矛盾和问题。

从今年开始到 2010 年,我们要力争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和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变。应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工作,我们在改革之初就开始抓,后来有过几次努力,但是都不尽如人意,主要原因是传统体制的约束。宏观层次的投资、生产和产业组织安排,在很大程度上

还是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在微观层次,一方面,国有企业的政企不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它们之间竞争不足,企业经济结构特别是存量资本结构的调整缺乏弹性,要素生产率低;另一方面,农村乡镇企业和城市集体与私人经济大多规模较小,过度分散,规模效益很低。在中观层次,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区域分割现象严重,并且各地攀比速度成风,投资扩张冲动,争铺新摊子,上新项目。这几方面的情况加在一起,虽然速度容易上去,但是,结构和效益总是不理想。由于速度与结构还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又使得我们的速度不能持续,增长的稳定性能差,经济活动时常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十多年的经验表明,要使我国经济真正转到稳定、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轨道,必须加快实现两大转变,尤其是加快市场化改革,在迅速建立适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大力培育市场,发展竞争。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解决好速度、效益和结构的关系问题,而且还要正确处理就业和通胀的关系问题。从现在起,到2010年,我们每年要为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国有企业释放出来的富余人员创造大约1000万左右的就业机会,这是我们面对的特殊发展背景。在制定发展政策时不得不把这个背景考虑进来,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要保持一个略高于那些就业压力较小些的经济的发展速度。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机制还不完善的经济而言,特别是存在地方攀比增长速度、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程度还比较高、投资饥渴的现象还较普遍的情况下,控制通货膨胀始终是我们的

一项重要任务。在我国,要将通胀率和失业率控制在一个既使资源配置效率高,又能保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水平,确实是一件极为艰苦的工作。为此,需要改进我们的计划指导,改进宏观管理,提高政策操作的技巧和有效性,需要加速宏观调控机制改革的进程。

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面对的是东强西弱、南富北穷的经济格局。在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30年中,我们采取集中计划、统调统配的方式,将东、南部地区资源(包括人、财、物)的一部分无偿转移到西、北部,比如在财政统收统支过程中,统收向东部强化,统支向西部倾斜,将一些大的工业设施建在中、西、北部,以达到区域平衡发展的目的。应该承认,这种行政式统调统配办法对于壮大中、西、北部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区域之间的竞争,限制了东、南部地区的发展。改革以来,原来以统收统支、统调统配为特征的完全集中型财政体制,已经转向相对分权化;在区域发展政策上,也更为强调在平等竞争中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这种强化区域竞争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搞活了地方经济,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基本解决了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平均主义问题。但东西之间、南北之间新的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又随之而来。前18年,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快一些,中、西、北地区相对慢一些,为了缩小这种不平衡和差距,其做法不是通过压低东、南地区发展的速度,不是简单地输血,来实现人为的平衡,而是通过加快体制改革、创造更为宽

中国经济发展研究论丛

松的政策环境,来加大中、西部发展的力度,来提高它们的造血功能。为此,我们还需要下大力气改变当前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保护主义倾向,在全国形成资源自由流动、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

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中国的最大优势是市场大,发展潜力大。在目前国民经济整体素质还不很高的情况下,我们要继续大力引进外资,引进一切对我们有用的技术,扩大对外贸易。从近 10 多年对外开放的实践来看,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比如如何处理开放和保护的关系,在对外贸易中如何实现用市场换技术、换管理、换机制,在引进外资中如何从数量型为主向质量型为主转变,以及在经济国际化进程中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和劳动力大国的贸易战略如何选择等。应该说,现在中国对外开放的门已经不小,国内市场上外国的东西不少,我们当然不要把门关小,而要开得更更大一些。但是必须看到,这些东西并未换回相应的技术、管理和机制,所以在今后的开放政策中,我们的重点不是在数量,而是在质量。

中国经济既是一个大国经济,又是一个发展中经济,现在的人均经济实力还不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它的发展空间很大。改革 18 年来以 9% 以上的年均速度增长,这不仅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奇迹,而且在同期的世界经济发展记录中也是一个不可小看的成就。到 2010 年时,我们仍将保持 8—9% 的发展速度,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才有希望在下世纪中叶初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完成小平同志“三步走战略”。中国经济

的繁荣,不仅会加速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将对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和平事业作出直接贡献。那种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世界是一个威胁”的看法,是毫无根据的,是完全别有用心的。无论世界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自己的路,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展宏图,创造辉煌。

1996年11月25日

前言

经过建国以后 40 多年的发展,中国工业在 90 年代中期似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带动工业发展的新“热点”没有显现出来:投资需求因控制通货膨胀的压力受到限制;具有较大带动力的新消费层面没有形成;出口动力因国内通货膨胀、出口退税和国际环境的影响有所减弱。这种状况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未曾有过的。人们有理由担心,工业继续稳定、高速增长的带动力在哪里?

——部分工业企业的困境继续加重:不仅是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额不断扩大和增加,相当一部分非国有企业也处于亏损状况下;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因市场前景不明朗和贷款高利息受到抑制;流动资金短缺和企业间拖欠严重制约着企业的运作;国有企业的改革举步艰难。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工业部门效率和掣肘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失业问题成为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方案选择的重要因素:工业增长吸纳就业的能力趋于弱化;国有企业中和城市集体企业中“下岗”的职工不断增加;维持员工基本生活所需的压力,迫使许多国有企业在产品大量积压和

中国经济发展研究论丛

亏损状况下继续运转;对失业问题的担心,是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工业受外部冲击的力度加强:关税水平的数次大幅度下调和非关税措施的明显减少,使中国国内市场更加开放;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对工业投资、产出、就业和进出口的影响显著增强;国内商品与进口商品、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在外商投资企业发展迅速的同时,内资企业深感压力很重,前景堪忧。

——行业性、区域性结构困境突出:一些在建国初期甚至更早时期建立起来的工业行业和工业基地,特别是传统产业和采掘业基地,因需求变化和资源枯竭等问题,陷入行业性、区域性困境之中,靠自身摆脱困境困难重重。

中国工业在 90 年代中期面临的上述问题,并非一些偶然因素所致,也不主要是政策运作失误引起的。它们是中国工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迹象,是市场化改革取得进展的标志,是进入国际工业体系时的磨擦和交融过程。在今后 10 多年内,大部分困难不会消除,有些方面甚至会强化。对这些困难要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这是制定中长期工业发展政策的出发点。

在讲足困难之后,我们仍有理由对中国工业未来 10 多年的发展作出乐观的预期。严峻的挑战是寻求变化的推动力,今后结构调整和体制转换过程将会加速,在新的发展模式和体制环境下,中国工业将进入新的持续、高速增长时期。

本书探讨中国工业未来 15 年的发展大趋势。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中国将要经历发展理论所描述的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要经历体制转轨中最为艰难的阶段。如能成功地跨越这个阶段,中国

就将实现跻身于工业强国之列的百年梦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工业发展将要经历哪些主要阶段,完成哪些转变,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工业的行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区域布局将会有哪些变化,出现何种格局?工业的开放式发展将会达到什么水平,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将体现在哪些行业和产品?工业发展政策的重点将指向哪些领域,对结构调整中不可避免产生的困难如何处置?这些都是关心中国工业发展前景的人所考虑、探索的问题,也是本书各个章节分别讨论的主题。

本书第一章简要描述和分析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努力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从19世纪中叶启动现代工业发展后,由于内外部不利因素的干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此后工业化才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工业化过程的推进大大加快。到70年代末期,中国已经由一个以农业产值为主的国家转变成成为以工业产值为主的国家,工业已经成为内部行业齐全的主要经济部门,一些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居世界前列。但是,这一阶段的工业化进程始终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失衡和低效率问题,致使中国工业化的实绩充满了矛盾:总量上是工业大国,人均指标上是工业弱国;速度名列世界前茅,效率居世界平均水平之下;结构失衡问题处处可见。

改革以来工业化的成就不仅表现在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在结构优化、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贡献和使更多的人民参与工业化过程等方面。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工业正在全面经历着一次蓄势已久的变化,面临许多困难,也出现了若干意义深远的新特征,预示着工业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

第二章对今后工业发展的条件进行分析。今后较长时

中国经济发展研究论丛

期内,中国具备工业持续发展所需的一般条件,而且在某些方面较之前 17 年更为有利。受国情特征、发展阶段和体制特点的影响,中国还具有几方面独特的有利条件。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中国都具备继续以较高速增长的条件。

第三章分析未来 15 年工业增长速度和结构转变趋势。要把握今后工业增长速度和结构转变方向,首先需要判断目前中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这一章指出,到 2010 年之前,中国工业将处在完成传统工业化与进行工业现代化两个阶段重叠进行的时期,这是由中国经济的特殊结构所决定的。这种在不同工业化阶段和层面上全面展开的工业发展过程,将为今后我国工业发展提供多种增长机会和多方向的结构变动。

本世纪之内,工业在 GDP 所占的份额大体上稳定在目前的水平上或略有上升,可到略高于 50% 的水平。在 2000 年以后开始略有下降。在这个阶段中,轻重工业都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其中重工业的增长会略快于轻工业,但两者之间速度差距不会太大,到本世纪末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所占的比重会略有上升。由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重叠进行的时期,中国仍要靠多元化的结构变动和多种产业并行发展以保持持续较高速度的增长,同时,也会出现一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突出的行业,可以称之为“主导产业”。但与发达工业化国家同阶段相比,“主导产业”的作用要弱一些。

第四章对今后 10 多年产业组织的重组与演变进行趋势性展望。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大企业总是占主导地位,因为中央政府易于控制也有能力集中财力物力建设少数大项目。改革以来,中国产业组织变化的主要方向是中小企业

的急剧增加和生产集中度的下降。这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不利于大规模生产和大企业发展的因素较为明显。这个过程市场竞争程度加剧,因此推动着结构的改善和效率的提高。

目前中国的市场结构和竞争态势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今后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受多种因素的推动,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在我国工业增长和结构变动中的作用将显著增强。与此同时,中小企业仍将持久地与大企业共存,从多方面发挥着与大企业不同,但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的作用。

第五章分析今后工业化过程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区域间自然条件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国家,工业化中的区域布局问题比较突出。在以往计划经济时期,区域间差异呈现出缩小的趋势,然而自80年代初期以来,又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今后中国工业发展的区域结构问题已经引起愈来愈多的关注。

制定区域发展政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政府的政策无疑将兼顾效率与公平,但其他因素也将对工业布局产生重要影响。在多种因素共同引导下,本世纪之内,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增长仍将快于中西部,进入21世纪之后,中西部的工业化过程将会加速,并逐渐取代东部成为推动全国工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第六章分析对外开放条件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自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以比工业高得多的速度发展,1995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已达2809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高达40%。这一比例不仅明显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大国,而且显著高于美国、日本、德国等较大的工业化国家。中国利用外资也已达到可观规模,

中国经济发展研究论丛

1979—1995年,实际利用外资2291亿美元,截止1995年底,已投产运营的外商投资企业已达15万家以上。这种状况是国际竞争力增强还是对外依赖性增强?在中国今后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的过程中,对外经济贸易和利用外资的规模、比重和结构应该怎样发展,发挥什么作用?这些是目前争议最多、观点不一、不确定性较强的问题。作者提出的观点是,今后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质量比规模更加重要,未来10多年,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将会适度放慢,但由于质量提高,外贸和外资对工业增长、结构转变、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将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第七章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景、带来的机遇、产生的冲击和应有的政策调整进行展望和分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工业不可避免地将在更开放性的市场竞争中发展,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国内产业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中,政府将不再负有责任或不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其他国家的实践表明,政府仍然有种种可行的方式,在保护国内产业和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方面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对大多数非重点保护行业的企业来说,除了尽快在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提高技术水平等一般性因素上提高竞争力外,企业行为的调整和必要防御战略的采用,对确保原有市场份额和开拓新市场也将起到重要作用。只有对策恰当,加入世贸组织才会成为推动而不是阻碍工业持续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因素。

第八章分析产业政策问题。在市场经济中,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经过近二十年改革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继续过多地依靠政府的产业政策来调整产业结构,已经很难做到,而且会引起较多的负面作用。同时,由市场竞争作为结构调整基本途

径的条件已经具备,今后我国大多数产业结构问题,应该由企业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自主进行。

由市场机制调整产业结构的思路适合大多数现存的结构问题,但是并不排除少数问题上继续保留甚至加强政府的产业政策。如基础设施建设、高技术高风险行业的发展、反垄断和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等等,都是典型的“市场失效”问题,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的重点领域,我国也需要在相应领域继续推行必要的产业政策。

第九章分析工业化过程中传统产业的调整和政府对这种调整的援助政策问题。前面8章中的主要内容,是如何促进有利于工业化进程的因素更好地发挥作用,本章的内容是分析如何弱化一些主要阻碍因素的不利影响。未来一二十年中,中国工业处在结构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在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会有一部分行业、企业和地区处在调整带来的剧烈冲击之下。国际经验和我国自己的实践表明,在结构变化剧烈的时期,如果不能采取措施,减弱变化对经济某些部分的剧烈冲击,变化的过程就会受阻,社会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变化率的降低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都会显著地增加经济成本,因此,减少阻碍变化和导致不稳定的因素,就具有显著的经济收益,这是对产业调整行为进行援助的正当理由。今后一二十年,产业结构调整援助政策的作用将会加强,成为产业政策的重要部分。